

郭果爾研究

著 岡澤秀虎

譯 韓侍桁

中國文藝叢書

中華書局印行

中國文藝叢書

郭果爾研究

岡澤秀虎著

韓侍桁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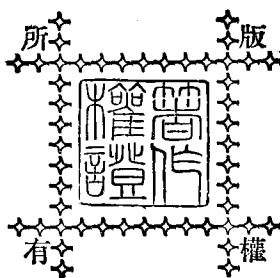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發行

中國女藝社叢書
郭果爾研究 (全一冊)

實價國幣四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原著者 岡澤秀虎

譯者 韓侍楨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(本書校對者萬迺騰 黃文顯) (一一〇五五)

譯者小引

最近郭果爾在中國大走運氣，已經腐爛透了的屍首，現在却又摩登起來。幾年前我從英譯本轉譯過他的兩篇小說，現在被那能從原文譯述的專門家證明爲有複譯的必要了。不管怎樣，這是於我無損，於人有益的事，但願那標準譯本能流傳永久，而我那被證明爲有複譯的必要的譯本趕緊毀掉，恐怕連郭果爾在九泉之下也會歡喜起來吧。

現今收集起來的幾篇論文，也是幾年前譯的了；大概沒有什麼價值，所以至今還沒有人覺得有複譯的必要，趁此機會我就暫且專賣一些時候吧。

原文續載在日本早稻田思想文學研究會編的文學思想研究上；分開來看，像是單獨的論文，接起來看，像是有次序的研究；也許岡澤先生並不認爲這幾篇文章合起來就可成一完整之作，所以事過多年並未成書。

了。
關於郭果爾的譯名，中文甚不統一，我因爲是舊譯，改起來太麻煩，就照舊仍用郭果爾這三個字

郭果爾研究

侍桁 一九三六年三月記

二

郭果爾研究目次

譯者小引

(一) 郭果爾的時代

(I) 郭果爾時代的概觀

(1) 浪漫主義與波黎佛義

(2) 官僚的國民主義者

(3) 普希金、普萊慈涅夫及拿戴支定

(4) 第二次「莫斯科夫斯基·拿布留達柴利」

(5) 西歐派

(6) 斯拉夫派

(7) 貝林斯基

目次

四六

四三

四〇

三七

三〇

九

二

一

一

- (II) 郭果爾的地位與意義…………… 六四
- (一) 郭果爾的藝術…………… 七五
- (二) 郭果爾的生活與思想…………… 一三七

郭果爾研究

(一) 郭果爾的時代

俄羅斯文學上的郭果爾的意義，不只在當時是偉大的，而實際上在現代也是偉大的。所謂在當時的意義者，是郭果爾的藝術的時代的意義。也便是，人類的一切活動——藝術也是其一，在其動機上，決不是可以超越社會以及時代的。所謂在現代的意義者，是郭果爾的藝術的人間性的意義。也便是，藝術家在其創作的動機上，雖不是可以超越社會的，但在藝術品的本身上；只要是還能夠讀的，其藝術的動機結果是超越時代的了。

一種藝術品的活的價值，非要照應着這兩種意義而決定不可。現在爲着研究的便宜，在這第一編上，是專檢討其時代的意義。

(I) 郭果爾時代的概觀

「俄羅斯文學上的郭果爾時代」這種名稱，是一八六零年代的指導者柴爾尼協夫斯基在「索烏萊門尼克」雜誌上評論四十年代的文學的時候，最初使用過的。但在最近，那有名的文學史家溫凱羅夫，說這種名稱是非常遠離着時代的本質的，而更倡言，三十年代的後半與四十年代，若呼爲「貝林斯基時代」是最適當的。（參照溫凱羅夫的「貝林斯基時代」）現在我不是把這兩種名稱，那一種是更適當，而作爲問題的。只是在郭果爾施其文學的活動的時代的意義上，把俄羅斯文學的這一個時期，稱爲郭果爾的時代。

爲着充分地理解在俄羅斯文學的歷史上，郭果爾所領有的偉大的社會的（時代的）意義，而通曉郭果爾時代的動靜是必要的。更進而在其時代上，人們給與郭果爾的批評，非加以檢討不可。

以下是關於這兩點稍加以精細的研究。

（1）浪漫主義與波黎佛義

在郭果爾開始文學活動的三十年代的前期，下瞰着僞古典主義的殘骸，是浪漫主義完全支配着的時代了，這種俄羅斯的浪漫主義，在其形式上，在其內容上，多半是取進了外國的要素。（法國以及德國的浪漫主義）因此在俄羅斯的浪漫主義中，有從法蘭西來的浪漫主義與從德意志來的浪

漫主義兩種流派。但從德意志傳來的浪漫主義，多哲學的要素，不能說是獨立的浪漫主義的運動，其後和官僚的國民主義合體起來，完全成功為另外的一種運動了。所以要把它以別的對象而論的，在這裏只是就着從法蘭西傳來的浪漫主義考察吧。

代表從法蘭西傳來的人，是尼格拉義·波黎佛義 (Polevoy 1796—1846)。他在俄羅斯文藝思想史上，占有值得注目的位置。他是把一個民族精神活動的最高表現之文學的，社會的，以及歷史的意義，給以明晰，而在雨果與初期的普希金的趣味上，建設了浪漫主義的理論的一個人。(參看畢葉托林斯基的「四十年代」一三四頁)

他和他的有力的同志馬爾林斯基，一同在機關雜誌「莫斯科夫斯基·泰萊哥拉夫」(一八二五年——一八三四年)上，研究了浪漫主義的發生的系路，而說那是與古代的詩文對立的新基督教的形式之中的事，舉了出來。但波黎佛義，與其是把浪漫主義加以哲學的說明，毋寧是對於把這種理論適用於實際上，更為有趣的。他舉出了三種東西，作為浪漫主義作品的實際的要素：即「國民性」、「普遍性」以及「抒情的傾向」。所謂國民性者，是獨特的國民精神的正確的表現；而且表現在「

國民的詩文上的國民性，對於全世界的進化上，非有普遍的價值不可；而這種普遍的價值，亦即普遍性。其次追求着含有這種普遍性的國民性，便是抒情的傾向。以上的話是詩人根據自己的理想觀照現實的主觀強調的精神。（扎莫琴的「三十年代的文學與批評」三一五——六頁）

站在這樣的浪漫主義的見地上，而從事於文學批評的波黎佛義，自然的結果，是激烈地否定了羅孟諾梭夫，斯馬羅珂夫，克尼亞支定以及其他偽古典主義的作家了。於是那從偽古典主義而生的浪漫主義的萌芽，由勃哥達諾微遲與戴甲溫的身上可以發見出來；其決定的轉向，由朱珂夫斯基身上可以看出來；其完全的勝利，更可由普希金的身上發見出來了。但對於普希金，波黎佛義是有兩種見解的。從一方面，他說普希金是俄羅斯的真正的詩人；而從另一方面，他把普希金的作品（「奧涅金」與「隊長之女」）與擺倫和斯哥德的作品相比較，又說那只不過是貧弱的模彷彿而已。即，他雖然能够理解了初期的普希金，而是不能理解後期的普希金的。至於講到郭果爾，那更完全是出於理解之外的了。在浪漫主義的作品中，受了文學教養的波黎佛義，正確地評價新寫實主義的可能性，完全地被剝奪了去。

但波黎佛義，在那些反對郭果爾的批評家之中，是最有力的，而且是最值得尊敬的人。他的批評

是辛辣的；時時越過了文學批評之境，帶些當時所謂「裁判的性質」（柴爾尼協夫斯基），但是顯示了他的賢明。他的批評雖是錯誤了，然而不是善良的。他的反對郭果爾，並不像那些官僚的國民主義者反對郭果爾似地，爲着個人的憎惡與自愛。他與郭果爾，在文學的傾向上，根本差異着了。被縛束於浪漫主義的趣味與法則的他，對於那在郭果爾的藝術上最初表現的單純與自然以及醜惡的描寫，無論如何是不能理解的了。但因此便來羞辱他，是沒有必要的，只能說他的反對者的那方面是比他更正確罷了。

郭果爾的最初的作品集「狄康喀近郊農園之夜」曾受了波黎佛義的讚揚。他從這個作者之中，認識出那生動地描寫民間風俗與人物的才能。這種好評的理由，是因爲在這些作品之中，郭果爾所有的那種浪漫主義的要素，是比寫實主義的要素爲更多，而且是很著目地顯示着。然而他以那只是適用於批評這些作品的尺度，更繼續着迎接了郭果爾的其後的作品。因此對於其後的郭果爾的作品，完全不能理解，而在否定之外是更無方法了。據他說，「檢察官」只不過是一篇笑劇而已，他說，在「檢察官」之中，「既無劇情，無目的，無結構，而又沒有明晰的性格。」這只可以說是不理解。在批評着這部偉大的作品的藝術的價值時，他的尺度是完全沒有用處了。

在「檢察官」之中，看見郭果爾的天才（在初期的作品中他所認識出的才能）漸漸消滅去的他，便公言郭果爾是已經用盡了他的全力了。就是對於「死魂」他也便沒有任何的期待了。他像這樣地批評着「死魂」：

「以前的善良的南俄的戲謔，以前的可愛的滑稽，以及這個作者在其諷刺畫中所顯示過的那種機智，我們已經看不出來了……在「死魂」之中，我們不斷地遇到那不可能的許多的事實……那成爲作者的友人們頌揚這部作品的理由的表現的自然與正確，可是在那裏存在着呢？……所有的這些，那引起嫌惡的精細，與醜惡的瑣事的滿篇，使得你在讀着「死魂」的時候，不知不覺地便扭過臉去了。」（根據柴爾尼協夫斯基的引用文）

而且波黎佛義在這篇批評的最後，給了作者這樣的忠告：

「你的靈感的雪花，請你暫時收住吧。而且學習着俄羅斯言語，再使我們聽到像你以前的那樣的故事吧。請你不要再寫像你的「魯馬」那樣無意味的事，以及像你的「死魂」那樣的謔語……」

（同前）

最明顯地說明這種非難的本質的，是他對萊芒托夫的批評中的這樣的話語：

「自然與人生，在其原封不動的姿態中，把並列着的生與死，善與惡，光與影，顯示給我們。在自己的畫面裏，若只選擇死與惡與影，你能够說是忠實地描寫了自然與人生麼？表現了那併有善與惡，天思想與地之思想的人類，藉着藝術的美麗的理想而爲我們和解了眼前所見的現實的不調和，在這裏才是存着藝術家的目的的。對於這種目的，「當代英雄」以及「死魂」果是適合的麼？」（同前）

當然，郭果爾的作品，是不適合於這樣的藝術觀的。根據這種批評可以知道，他在郭果爾的作品中，只是看見了單調與醜惡，於是生出了，爲什麼從光與暗共有的人生裏只是描寫暗的一面這樣的那非難來。這種醜惡的事物的描寫，如郭果爾在其「黎泰拉慈爾奴義·拉紫葉紫德」中說明過的那種重大的意義，他是完全不理解的。在這裏我們沒有旁的方法，只得說時代是已經不同了。

關於波黎佛義對於郭果爾的關係，貝林斯基這樣地講着：

「就連下面這樣賢明的人們，都成了新的天才的敵人了。這些人們已經在這世界上生了許多年了，因爲在那種世間周知的思想形式中堅確地凝固了的結果，他們在新的真理之中，動不動地便易於看到那真理的暗處。在這些人們中，在自己的時代上，是比任何人都更多理解的，現在雖是老了，但若有一個人會是對於新的真理的擁護者的話，那麼那個人對於新的天才的軟弱的反抗，非是怎

樣的東西不可呢。(在所謂那種新的天才之中，他是感到某種東西的，但沒有理解的力量。)而且假若以這種賢明的高明的見識前進，成了微小的易怒的自愛的主人的話，他對於新的天才空洞無力的爭鬥，是將成爲怎樣可憐的展覽品呢？(但現在這種人是成爲時代落伍的人了，成爲軟弱的無用的富於嫉妬的性格了。)(貝林斯基全集第三卷七二二頁)

在這樣短短的話語之中，很好地顯示出波黎佛義的本質的確，在郭果爾出現以前，他曾是一個新的真理(浪漫主義)的雄壯的戰士；這是二十年代的自由主義之偉大的後系。因此他的奮鬥，不久便爲保守派深深地憎惡着了，受了命令停止機關雜誌的迫害。但這位曾是新的真理的擁護者的人，當另外的更新的真理(寫實主義)產生出來的時候，他已經不能理解其意義了，於是同着從前的敵人結合起來對着這種新的敵人進攻了。因爲這種關係，由波黎佛義看來，郭果爾所享受的高高的評價，是不正當的。所以當他看見這位只是無罪的丑角的郭果爾，而自信自己是有深刻的哲學傾向的偉大的作者，其罪過全要歸於他的諂諛者(特別是貝林斯基)。但貝林斯基並不覺得他是怎樣特別諂媚郭果爾；而且一點都沒有給與他以直接的影響，假若說會是給與他以任何影響的話，他恐怕不寫「給友人的書簡的拔萃」了吧。所以，在郭果爾之中，若是有着「傲慢」的氣質的話，那是

從他的自信中生出來的，而不是因為貝林斯基的諂媚。關於這一點，波黎佛義像對於郭果爾似地，對於貝林斯基的一派，是同樣完全地不理解。波黎佛義是以那成爲當時哲學之混合的庫真哲學，爲其思想的根柢，而貝林斯基一派，是由黑格爾哲學養成的，所以他們的不合是當然的了。他們在藝術上的不一致，其實也便是思想上的不一致。而且在當時，文學是最有力的社會的機關，於是他們的論戰是越法激烈了。

如貝林斯基的批評已經明示出來的，在波黎佛義的記憶上的最大的黑點，便是最初曾是文化運動的指導者的他，晚年成了反對者了。但這是自然的系路。出於他的豫定以上，他的子孫（時代）前進了。他始終一貫地，並沒有改變浪漫主義的信念。就是因爲這種理由，他雖是一個賢明的人，而不能理解新時代與新傾向了。他的結論的誤謬，便是因爲他總是忠實着那與時代同樣成爲腐舊他的主義。但他是一個高貴的真實的人的這種事，是不能懷疑的。

波黎佛義的功績，是在俄羅斯的雜誌文學上，給與了批評地獨立的正當的位，置在其後出現的拿戴支定，特別是貝林斯基的活動上，作下了間接的基礎。

(2) 官僚的國民主義者

從德國傳來的浪漫主義，在俄羅斯，與官僚的國民性密接起來，完全成了另一個潮流了。對於國民性的他們的羅曼蒂克的共鳴，成了奈威的愛國主義，成了排他的自尊心。代表這一團的人，是協威烈夫 (Shevyrév) 與波果定 (Pogodin)。這一團，在當時，是很容易和斯拉夫派混合的，其後由皮蘋起了一個「官僚的國民性的團體」的名稱。（皮蘋的「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文學思想的解剖」九三頁——一四一頁）

但在官僚的國民主義之中，除去這一團之外，不能不舉出那與浪漫主義略有關係的雜誌文學者之一團。代表這一團的，是沈珂夫斯基 (Senkowsky)，布爾加林 (Bulgarin) 與哥萊齊 (Grech)。前者是呼為「莫斯科的二人團」，後者是呼為「裴柴爾布爾堡的三人團」。前者的機關雜誌，最初是根據「莫斯科夫斯基·威斯特尼克」（一八二七年——三零年），只成為浪漫主義的後繼者；其後主宰了「莫斯科威茶寧」（一八四一年——五六年），宣傳着官僚的愛國主義；後者的機關雜誌，是「比布羅柴略·多利亞·契柴尼葉」（一八三四年——六四年），而且發行了「協威爾拿亞·普柴拉」作為機關紙。這種反動的團體，在四十年代，在西歐派尚未完全握住了主權的時候，與西歐派及斯拉夫派是鼎足而立的，要把俄羅斯市民的历史各自導於不同的方向，而繼續了激烈的